



北京红色文化的厚植与积淀

□刘锋



抗日英雄吉洪昌

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无数爱国学生用革命斗争实践书写了青年群体的爱国情操，用鲜血和生命展现了爱国的深厚力量，凝聚起激励无数仁人志士投身于革命斗争实践的抗战精神。

抗日斗争中彰显革命气节

中共北平地下党坚持隐蔽斗争，不屈的北平人民同舟共济，誓死抵抗日本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以吉鸿昌为代表的抗日英雄用生命抵抗日本的殖民统治，为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重大牺牲。宁死不屈、誓死抗日的革命气节得以彰显，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精神传遍全国各大城市，北京红色文化的内涵得到了丰富与拓展。城内的地下斗争与郊区根据地的武装斗争相配合、青年知识分子走出城市与乡村的工农群众相结合、城内的各阶层人士继承和发扬爱国传统坚持对敌人斗争不息，是北平人民抗战的突出特点。北平人民一直战斗在敌人的战略后方和华北统治中心，严重地威胁敌人的后方统治，干扰敌人的指挥中枢，有力支援了华北抗战。另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平郊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建立政权、减租减息、大生产和整风运动，使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总之，北平地区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抗战的疆场上赴汤蹈火、英勇捐躯，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表现了气壮山河的崇高革命气节和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用热血和生命书写了动人魂魄的英雄史诗。

平郊烽火中升华红色基因

在北平人民积极抗战的悲壮事迹中，平郊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以及卢沟桥、南苑、南口等地的抗战，鼓舞了包括北平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彰显了北平人民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与斗争精神，凸显了中国人敢于斗争、敢于担当的内在特质。

卢沟桥事变爆发激起全民族与日寇决一死战的昂扬斗志。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守军29军奋起抗击，北平人民义愤填膺，誓与日寇决一死战，彰显了众志成城助推动战决胜的决心和使命。

浴血南苑的忠勇气节为后人敬仰。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向南苑发起进攻，在日军数千人的猛烈攻击下，南苑的营房很快被炸毁，通讯设备遭到破坏，部队失去联络。面对这种极其不利和十分惨重的战况，南苑守军顽强抵抗日军的侵略，在强敌面前不畏缩、不胆怯，舍生忘死与敌交战，许多人倒在了血泊中。他们的壮烈牺牲，为中华民族伸正气，为祖国山河壮声威。他们的爱国精神、忠勇气节，给后来的抗战军民以鼓舞，为后人所敬仰。

南口抗战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救国斗志。南口战役是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第一场大战役。“在18天苦战恶斗的拉锯战中，中国守军上万官兵断臂折股，流血牺牲，上千具血肉之躯，永远倒在南口一带山区”。在南口血战中，中国广大参战将士同仇敌忾，与侵略者以死相拼的英雄气概，他们的爱国精神、浩然正气，为全国人民树立了榜样。这是在探索民族富强道路和坚持救亡图存这一红色基因的影响下进行的，进而为北京红色文化的积淀与拓展提供了生动的实践素材和发展基石。

（摘自2024年4月8日《北京日报》）

谷文昌往事

□钟兆云

骑着一辆轮子嘎嘎响的自行车走村串户，是谷文昌在东山县14年里最广为人知的模样。

他原本不会踩单车。为方便下乡调研工作，他开始用一辆旧“二八”自行车，晚饭后到县委门口的广场，由通信员当教练，学习骑车。经过几回练习，他终于掌握了基本要领，但毕竟年纪大了，手脚同身子配合不甚灵活，不免有时摔跤。

身边工作人员担心他摔伤骨头，便给他置换了一辆车身矮小的旧自行车。此后，谷文昌就是骑着这辆车，在东山县的山山水水留下坚实的足迹，在田间地头闪烁着辛勤的身影。

县委办干部林泽传有次和谷文昌连骑两个多小时自行车，翻坡越坎来到目的地时已两腿酸软，谷文昌却抖擞着精神立即开始了工作。谷文昌担任行署副专员后，林泽传有次去漳州开会，在行署门口忽然听到熟悉的声音，回头看竟是谷文昌从自行车上下来。他便问：“您不是配小车了吗？”谷文昌笑着说：这不也是“专车”吗？自己骑车上下班，既省事又锻炼身体，还可以给公家省油钱。

然而，就是这么辆自行车，他也是严格要求公车不能私用。有一次，

儿女们趁他不在家，又忘了给自行车上锁，便骑出去玩了会儿。他知道后严肃批评了孩子们：“这是公家配给我工作用的‘专车’，你们怎能这样公私不分！”此后，哪怕“专车”又没及时上锁，孩子们也不敢再碰。

1960年4月，谷文昌带着县委组织部干事林木喜和警卫员潘进福，深入条件极为艰苦的湖尾村蹲点。三人住在一间低矮昏暗的老屋，找些杂草铺在潮湿地板上，盖上草席就成了床铺。他们白天和农民一起下地劳动，晚上走访看望困难群众，接着还要在煤油灯下熬夜写调研材料。他们的三餐也都和社员一样，喝食堂的番薯丝煮青菜汤。公社书记不忍，悄悄煮了份稀粥送去，谷文昌坚决谢绝：“领导干部就得和群众吃一样的饭、受一样的苦、干一样的活，才能得到群众的信任、维护党的威信。”

由于长时间的劳累，谷文昌的肝、胃相继出现病症。在妻子的关切和地委领导的过问下，谷文昌不得已停下手头工作，到漳州检查。接待处按级别规定，给他安排了一个每天10元、有卫生间的套房。他却谈“价”色变，连连摆手：“我们东山是贫困县，住不起这么贵的房间。”不由分

说就拉着通信员出门找便宜旅馆，住进了一天只要1.2元的普通客房，还是两人同挤一张床。

花公家钱时精打细算的谷文昌，却不在于自己的钱。

县委副书记宋秋涓要抚养膝下两子、赡养夫妻两边的老人，开销很大，生活过得不免拮据。一天，谷文昌看到他的衣服和裤子都打着补丁，当即掏出钱来，让他添置两件衣服。宋秋涓知道谷文昌的情况——谷文昌的子女以及岳母、侄女都挤在两间低矮的小瓦房内；房里既无卫生间，也没饭桌。看到书记一家人多房少，县委办表示要多调一间房给谷文昌。谷文昌说，不行，不能特殊，人口多住不下是我的事，得由我来解决。

谷文昌调任省林业厅副厅长后，二女儿为婚事找父亲批点木材做家具。他不留情面地说：“我管林业，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的女儿批木材，无异于监守自盗；我犯错误不说，下面就会有大小领导跟着这样做，那就错上加错、大错特错了；当领导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才行啊！”被任命为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后，谷文昌的家中依然只有公家配给的床铺，和几张自己添置的藤椅。有来访者问：“怎么不买些



木制家具？”谷文昌回答道：“我管林业，家里如果一下多了几件木家具，既怕别人说我揩公家油，更怕误导别人，助长乱砍滥伐之风。”

1975年夏初，《福建文学》主编季仲赴东山采访，偶遇谷文昌。多年后，他在散文《绿色礼赞》中如是着墨：“（谷文昌）灰白平头短发，黧黑瘦削脸颊，额上皱纹很深，一双青筋暴突的手掌特大。他大概刚从野外归来，灰布衣泥痕斑斑，脚下一双当兵人穿的解放鞋，挽起的裤脚尚未放下。墙上挂着草帽、毛巾、水壶，墙角搁着柴刀、锄头……”

（摘自2024年3月27日《解放军报》）



邹韬奋和《全民抗战》

□刘思琪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邹韬奋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战方针政策，积极动员广大民众投入救亡运动。8月，邹韬奋在上海创办《抗战》三日刊，内容主要以时政、述评、战地通讯为主。该刊除邹韬奋外，主要撰稿人还有金仲华、胡愈之、郭沫若、张仲实、柳湜、钱俊瑞、艾思奇、杜重远等。在他的精心编辑下，《抗战》三日刊很快就获得全国民众的青睐，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影响力最大的救亡刊物之一。

因上海沦陷，邹韬奋等人赴武汉，于12月23日在武汉出版第30期，并恢复原名《抗战》三日刊。《抗战》三日刊出至第86期后，于1938年7月7日与创刊于1937年12月11日，当时出至第2卷第5期的《全民周刊》（社长为沈钧儒，编辑者李公朴、柳湜）合并办刊，改刊名为《全民抗战》三日刊。该刊以邹韬奋、沈钧儒、艾寒松、张仲实、胡绳、柳湜等6人组成编委



邹韬奋

会，邹韬奋任主编，柳湜任副主编。初期的《全民抗战》“逢三、六、九发行”，为16开12页，双面印刷，没有封面，第一页刊头正上方居中写有“全民抗战”四个大字，四个大字左右两边竖排分别注有“全民动员”“抗战到底”8个字

（创刊号除外）。该刊以“巩固全国团结，提高民族意识，灌输抗战知识”为己任，设有社论、三时事、信箱等栏目，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统一战线等各个方面。为了激励士气，《全民抗战》于8月19日增出了《保卫大武汉特刊》，受到广大官兵的热烈欢迎。

10月15日，《全民抗战》从第30期起迁至重庆出版。由于当时纸张、油墨等物资供应紧张，印刷、邮寄条件十分困难，该刊由三日刊改为五日刊，“每逢五、十、十五、二十、廿五、三十日出版”，仍然为16开，但页数从原来的12页增至16页，新增了封面漫画、诗歌等内容。

邹韬奋在主编《全民抗战》的过程中，得知前方将士缺少精神食粮，于是决定发行《全民抗战战地版》，免费赠送给前方的将士。此举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受到了前方将士的极大欢迎。1939年8月12日，当《全民抗战》发行第83期时，全

民抗战社又针对一般读者发行了在“内容安排和文字使用上，特别通俗易懂性”的《全民抗战通俗版》，以普通群众“自己的语言和常用的文艺形式”和大量的木刻漫画，向广大群众宣传抗战，在群众中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全民抗战》也因此迅速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影响较广且深受欢迎的刊物之一，销售量一度突破30万份。

由于敌人的封锁和轰炸，重庆出版业面临严峻的形势，《全民抗战》的出版工作也日益艰苦。从第70期开始，《全民抗战》由五日刊改为周刊，逢周六发行。

由于《全民抗战》真实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业绩，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投降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径，引发了国民党当局的嫉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全民抗战》于1941年2月被查封停刊。

（摘自2024年3月21日《人民政协报》）

承载东北抗联精神的靰鞡

□王凤春 白雪

靰鞡，是满族人发明和使用的一种防寒鞋，通常由兽皮或畜皮缝制而成，鞋里絮上乌拉草，既舒适又暖和。抗日战争时期，靰鞡是部队冬季作战的重要装备。一双双靰鞡陪伴着东北抗日联军将士穿行于白山黑水、战斗在茫茫林海，见证了东北抗联将士艰苦卓绝的斗争，成为东北抗联精神的承载。

1933年10月10日，在珠河县铁道南的三股流，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正式成立。作为哈东地区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在初创之时就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在行动中，他们一方面与义勇军、山林队等抗日武装力量联合，积极斗争扩大游击区；另一方面密切联系广大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促进军民关系。游击队通过一系列战斗行动，打击了当地反动武装和汉奸地主，战斗缴获除满足游击队生活、战斗基本需求外，主要惠及当地百姓。部队每到一处便首先召开群众大会，严明军纪，互帮互爱，很快，游击队的政治、军事影响得到扩大，赢得群众的爱戴与支持。

到了初冬时节，群众发现游击队的一些战士连过冬御寒的鞋子都没有，便买了几双靰鞡，由百家长（也称甲长，相当于村长或屯长）送给游击队战士。赵尚志想拿钱买下这些靰鞡，可百家长坚决不收。赵尚志耐心解释道：“我们拿枪打仗是抗日，您替我们买东西、支援游击队，也是为抗日作贡献。游击队和老百姓是一家人，咱们团结起来，才能把日本鬼子赶出去。”赵尚志的一席话，让百家长十分感动。这件事一传十传百，群众真切感受到游击队纪律严明、爱护百姓，是一支真正的抗日队伍。

众所周知，东北抗日战争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这种“极端困难”来自于凶恶无比的斗争对象和异常艰苦的斗争环境。自日本侵略东北开始，日军强制推行归屯并户，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下制造“集团部落”和“无人区”，以法西斯统治和暴力割裂东北人民与东北抗联部队的联系，企图饿死、困死东北抗日联军。日伪军数次发动疯狂的“大讨伐”，采取重兵“围剿”的方式向东



北抗日联军展开进攻，以残酷毒辣的手段“扫荡”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破坏抗联密营和仓库。到了冰天雪地的严寒季节，东北抗联部队的生存和战斗环境更加严峻。为抵抗饥饿，抗联将士只能以草根、棉絮、树皮充饥，连抵御严寒的靰鞡都成了果腹之物。据抗联战士李敏回忆，1939年的大年三十，由于抗联部队长时间没有粮食补给，一名指导员把自己的牛皮靰鞡交给司务长，为同志们煮一顿靰鞡汤当作年夜饭。然而，靰鞡汤还没煮好，

敌人的枪声就响起来了，司务长为保护这顿珍贵的“年夜饭”付出了宝贵的生命。茫茫白雪掩映的是流淌的鲜血与滚烫的年夜饭，东北抗联将士只能化悲痛为力量。

抚今追昔，睹物思人。靰鞡作为东北抗日战争的文物之一，与那段抗击侵略的历史同在，它承载的坚贞不屈、勇敢顽强、不畏艰苦、百折不挠的抗联精神价值，已经远远超出御寒和充饥的实用价值。

（摘自2024年2月8日《中国国防报》）



抗日战争时期，北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英勇不屈、百折不挠，同敌人展开了殊死战斗，“从‘一二·九’运动到卢沟桥抗战，从平郊烽火到开展隐蔽战线的斗争等，无不凸显了北平人民不畏强暴、血战到底、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与民族气节”，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烈诗篇，赓续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发扬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怕牺牲、敢于担当、救国救民的优良传统，为厚植北京红色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抗日救亡中发扬爱国情怀

1931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遭到了学生、工人等爱国群体的奋力反抗。在民族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及时地发出抗日救亡的呼声。北平地下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对抗日救亡运动予以积极的领导，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向前发展。

北平学生南下请愿示威呼吁全国抗日到底。北平各大学纷纷发表通电、宣言，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领土，表达誓雪国耻的决心。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北平各阶层广大爱国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各界舆论一致谴责国民党当局的做法。南下请愿示威运动在总体上只是局限于学生运动的范围，尚未深入工厂、农村，进而唤起广大民众做学生运动的后盾，但这一行动揭露了南京政府“不抵抗主义”的卖国政策，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唤起了各界民众的爱国热情。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队”）将爱国救亡精神传播到各大城市。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民先队”成为党联系和领导全国青年抗日的纽带、宣传思想和团结民众的得力助手，它为党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各革命根据地培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干部。正是在